

中國當代文化現象

陈漱渝◎主编

TOUSHI BOYANG

透视 柏杨



柏杨(1920-2008)，原名郭定生，出生于河南省开封。1948年沈阳被解放军攻下后，柏杨前往北平，1949年再转往上海，之后又随老师吴文义前往台湾。1960年5月起，以笔名“柏杨”在《自立晚报》担任《倚梦闲话》专栏作家，写作的杂文对于现况有很严厉的批判。

孙以年◎编

人文大师，当代华文世界不朽的阅读图腾

透过众说纷纭的文化现象
重现真实的人生百态
揭开惊人的重重迷雾
让你把握历史的航向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

中國當代文化現象

陈漱渝◎主编

TOUSHI BOYANG

透 视

杨 杨

孙以年◎编



透过众说纷纭的文化现象

重现真实的人生百态

揭开惊人的重重迷雾

让你把握历史的航向

大眾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透视柏杨/孙以年编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1.4(2009.5 重印)

(中国当代文化现象)

ISBN 978 - 7 - 80094 - 967 - 8

I. 透… II. 孙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③书信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1622 号

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- 2001 - 0837 号

书 名 透视柏杨
作 者 孙以年
责任编辑 钟 艺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邮 编 100009
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358 千字
版 次 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50 元



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

——对名作家柏杨生平的个案透视

(代前言)

唐德刚

作为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,从大学时代开始,笔者便一直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“转型史”。在政治制度上,我们要从三千年未变的帝王专制制度,“转”向今后三千年也不会有本质上变动的民主政治制度。这是个历史上的必然;是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逆转的历史上的必然。只是这个转型运动,有两个严重的属性:(一)它是一转百转的。这种政治制度一旦转变,其他社会文化制度,也随之转变,随之或前或后作不同速度的转变,以相配合。(二)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变,需时至少二百年。同时这项转型,不是我国文化中自动发生的。它是在西方强势文化挑战之下,被迫发动的。发动的契机便是鸦片战争(1839 - 1942)。这项转变即经发动,它就强迫了我们千年不变的文明,走上十年一变的大动荡时代。这一动荡时代至少要延续至两百年之久。换言之,就从 1840 年前后,一直延长至下一世纪 2040 年代,中国才会恢复安定,成为今后

世界上一个超级强权的民主大国!因此这一动的两百年,笔者姑名之曰“历史三峡”。

历史三峡中过峡的英雄好汉

这个历史三峡是惊涛骇浪的;通过这个三峡的亿万渡客,在惊涛骇浪之中,浪打船翻,也是死人如麻的。因此今日在座的听众,和不在座的读者,也都是三峡中的渡客。今年六十岁以下的渡客,或可在四十年后,享受点民主中国的盛世;六十以上的人就只有在峡中,度其余生了。

在我们这些亿万的客群中,当然多的是名儒硕彦,和英雄好汉。但是三峡不是



桃花源。通过这一惊涛骇浪，几人欢喜几人愁，纵是天大的英雄，每人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本文的主旨，便是想翻翻当代名家柏杨郭衣洞先生那本难念的经。做点个案研究。见微知著，利用微观史学的法则，看看这位作家在历史舞台上所表演的一场极其精彩的悲喜闹剧。一叶知秋，这一时代的文化转型史的实况，吾人由于对柏杨的探讨，或可略窥其余。

· 受晚娘迫害的小动物

柏杨的生平，在他呱呱堕地之日始，便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标准化的形象——他是受“晚娘”虐待的一个小孤儿。“晚娘”是我国传统社会里一桩极可怕，却最标准的一种“建制”。传统中国由于医药落后，产妇死亡率之高是惊人的；产妇即死而留下幸存的孤儿，纵在富厚，富贵之家，这无母孤儿也是人间之至惨也。如果这孤儿又家境贫寒，再加个泼辣的晚娘，那这小动物的可悲，就禽兽之不如了。最惨的还是他的天真无知和无告。其终生不灭的心灵上所受的创伤，实百十倍于体质上所受的虐待。这种可怜的小动物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数量，应该以“万”为基数吧。三千年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一波一波的出现，未稍息也。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渡出来的人，耳闻目睹，亦未尝尽也。民间舞台和说部上的故事，就更是说不完的了。可是这批小动物，在三千年国史中，该有几千万人，却基本上是个无声无息的盲哑集团。社会国家对他们一贯是无视无闻；他们对这社会，也无怨无艾。这桩人世间最足牵人魂魄的悲惨的社会现象，就任凭它无声无嗅地的重复几千万遍，而被视为当然，这是什么样的文明社会呢？老实说，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，在这方面就人道多矣。——想不到郭衣洞柏杨，这位不世出的名作家竟然是这样一个“小动物”的出身。他在晚年竟能以最生动的笔墨，把这宗极可悲的社会惨剧描写出来。吾翻阅《柏杨回忆录》（也是一部中文的《块肉余生述》吧）至此，而掩卷不忍卒读，甚至情难自己，而凄然垂涕。吾非为柏杨个人悲，我为中国社会上，中国历史上，千千万万，无知无告的小动物而垂涕也。个人不学，不知《四库总目》中，亦可查出若干类似著作否？如果没有，那末柏杨也就是这类千千万万，无知无告的小动物的，惟一的历史家和发言人了。柏杨自己可能尚无此自觉也；他的亲柏反柏两大读者集团，可能亦见未及此也。但这却是中国传统社会里，任谁也否定不了的一桩社会史实；未经过社会史家详细著录的社会史实，而柏杨著录之也。





幼年不幸安知非福

心理学家都知道,在这种心理背景成长出来的青少年,往往都具有强烈的爱憎之心。他将成为一个走极端的人物: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;不能五鼎食,就应五鼎烹;生不能留芳千古,死后就应遗臭万年……总之他不是个你我一样的“常人”。他是个敢作敢为,拿得起放得下的“非常人”。他那惨烈的幼年锤炼,就锤炼出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个性。要顶子红;就不要怕颈子红;砍掉头,碗大疤,怕个什么?当然这只是那些幸运而有智慧的孤儿。逃不出这一关的小动物就不忍卒言了。

朋友,我们这个社会国家;我们这部《二十五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,便是这种“非常人”,率领我们(你和我)这种千千万万,畏首畏尾的“常人”制造出来的。——我不是说,所有的“非常人”,都是幼年时被“晚娘”虐待出来的。“他们”之所以能变成“我们”的“领导”;变成我们的“首长”、“导师”、“舵手”……主客观的条件多着呢。毛主席的母亲便是一位慈母。但是毛公那种“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”的个性,可能便是他那位严厉的父亲,一拳一脚揍出来的。他老人家后来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最乐的人生观,可能也就是在青少年期,“与父斗”开始的。

第一个丑陋的中国人

君不见,柏杨晚年曾有名著: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这就是一本常人所不为,不敢为,也不愿为,而却有高度说服性的名著。据柏杨自道,和他人的转述,在他的游美期间,群集爱荷华的热情信徒们,正欢聚一堂,提耳恭听,这位万里外从祖国飞来的教主,宣扬中华文化是如何的博大精深,以便照本宣科,好向洋朋友、洋邻居、洋同事、洋学生、洋女友炫耀一番。想不到所听见的却是对“丑陋中国人”的一场诋骂!骂得众信徒,个个黯然神伤,垂头丧气;骂得在场的洋听众也丧魂落魄;有的也掩口窃笑,不能自己。而讲演者柏老,却振振有辞,意犹未尽!坐在他对面的,正是“丑陋的中国人”,流落在海外的丑陋的代表!

朋友,你说柏杨疯了。六七十岁的人了,还不通人情世故。怎能在热情的欢迎群众之前,大骂其“你们都丑陋不堪”呢?可是诸位如有认真读闲书的习惯,你就知道没啥稀奇。据婴儿心理学的记载,一般婴儿,尤其是男婴,都有恋母情结,他认为人世上最美的,最善的,最真的,最可爱的,就是经常抱着、吻他的那个叫她“妈



妈”的女人。

柏杨记忆中的幼年，身边也有他叫“妈”的女人。但是这个“妈”既不抱他，也不吻他。动不动还要打他，扭他，骂他，非理性的虐待他。她呢，既无真，又不善（连伪善也没），更无美。相反的，她显得丑陋不堪，而她却是他的“妈”。因此在柏杨的经验里，他八十年的生活史中，他所接触的第一个“中国人”，他叫“妈”的中国人，就是个“最丑陋的中国人”。在柏杨的经验里，连个最可爱的“妈妈”，都是个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你我是老几？坐在柏杨对面，能自觉“我比城北徐公美”？！

丑陋不是事实？

朋友，别泄气，更别生气。你我在柏杨的眼光里，都是丑陋不堪的“丑陋的中国人”。我们这十二亿华裔同胞里（甚至包括数万，甚或数十万，以身上有中国血液为耻的台独“好台”们，注意他们已不再是“好汉”），很多英雄好汉，都自觉甚美。其实我们也确是一批柏杨所谓“酱缸文化”泡出来的狗熊，坏汉，其丑无比。我们的英雄好汉们（包括“好台”们），何不自我检讨，何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何等样人，是美还是丑？

余读柏杨书，从最原始的“酱缸文化”开始，到最近的论丑陋之文，朋友，不瞒你说，甚不是滋味也。原因很简单：余亦“中国人”也。对镜自窥，竟若是其“丑陋”乎？然余细读德裔汉学家周裕耕博士（Dr. Jurgen Ritter）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《酱缸》（墨勤译，1999年，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），不无感慨也。不才尝为博士导师也。面对此以柏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博士论文，将如何置评呢？鸡蛋里找骨头，小问题挑剔不尽也。但是涉及它的基本问题，柏杨所提的酱缸文明中，丑陋的一面，难道不是事实？我们文化里有欠人道的野蛮的一面，我们无法否认也！五四时代的启蒙大师们，抓着“小脚”和“辫子”，便大做其文章，说我们的传统的文明是如何如何地野蛮，连这个最不人道的“缠足”，也容忍了一千余年而毫无异辞！朋友，您还不知道，我们传统文明里，有一种叫做“人菜”呢。王渔洋的《池北偶谈》就记过这一人菜的故事，说在人吃人的饥荒年代，狠心的丈夫或父亲，往往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当成猪豕一样的家畜，绑起来给人铺，让顾客们论斤购买食用呢！——你能说我们传统文明的“孔孟之道”，是如何伟大？

以上所举只是些具体小事例，已把我们的传统文明弄得丑陋不堪，至于那些视而不见的社会习俗之丑陋，就书之不尽了。大的如“脏唐臭汉”中皇族的恶行；职业官僚中，逢迎和吹拍的丑事。小的如孙中山先生告诫华侨不能“随地吐痰，当众放屁”的恶习，都丑陋不堪呢，而我们视为当然者，数千年！你我“中国人”，还有脸



皮自炫,我们传统文明是如何之美?!——这些都是一些任何“中国人”,所无法否认的具体事实。

在民国史上,有些口口声要发扬固有文明,提倡“读经”的文人和军阀,你去查查他们妻妾成群,贪赃枉法的私生活,却没一个例外,都是“丑陋”不堪的。这些都是绝对的事实?因此我们那位,目光锐敏,观察深入的柏杨,一旦接触了现代基督文明,和彬彬有礼的现代西方社会,两相对照,就看出我们自己是如何丑恶了。——愤激的心情,再加上个尖刻文笔,扒起粪来,蛆虫毕露,被揭发者,衔恨入骨,就要置这很尖刻的扒粪作家于死地;而好之者,喜其入木三分,痛快淋漓,就逐渐形成个无形的柏杨主义的文化圈了。结果就对立统一,永远难解难分了。誉满天下,谤亦随之;恨满中国,爱遍世界。这就是柏杨先生在前述的三峡舟中,所扮演的一场悲喜剧的基本性质。

“酱缸”中国人无专利权

但是我们这些写历史的,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们,对柏杨主义,和由柏杨主义引申的博士论文,有没有若干评语,批语呢?这是任何博士论文都是免不了的一关。

首先,周裕耕这篇博士论文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未能掌握好比较史学的法则。柏杨所揭发的“酱缸文明”,是否是中国文明所独有呢?西方固有文明,是否也是个“酱缸”呢?我们这些教授世界史,和比较文化史的教师,所能提出的粗浅的答案,是中国史家对这个大“酱缸”无专利权。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。站在“现代阶段”这一高坡之上,回看过去历史,则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,无一而非酱缸也。

先看看所谓“西方”。古希腊罗马那个残酷的“奴隶制”,就是个大酱缸。这个大酱缸,我国社会发展史上,反而没有。我们有少数奴隶(Slaves)而无奴隶制(Slavery)。两相比较,我们的酱缸还是个“比较好的制度”(a better system)呢!

再看看中古西方。文艺复兴史家,叫它做“大黑暗时代”。那个万能的上帝在大黑暗时代所制造的酱缸;也远比我们皇帝造的酱缸,污染更甚呢!说来话长,限于篇幅,无法详谈。

再看看回教文明和印度文明。有次有位信仰印度教的教授,在我们亚洲史班上,为印度的烧寡妇、杀新娘(因妆奁不足)的传统陋习作辩护,我就曾公开地教训过他。因为我和我的学生,对印度那个大酱缸,实在无法忍受。

重复一句,站在“现代文明”这个立场,回看“古代文明”和“中古文明”,则没有哪个“民族文化”不是个大酱缸。今日我们这个亚非拉第三世界之可悲,便是我们



把“中古文明”给无限期延长了。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“现代文明”的阶段。柏杨他老人家，今日是站在“现代西方文明”这个高坡上，回看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古文明的中国传统文明，则我们的传统文明就是个大酱缸了。

西方白种人的神气是他们已摆脱“中古文明”，已将近五百年了。而我们今日还在中古文明的边缘打转，怎能不令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先生生气呢？周裕耕博士把柏杨思想未搞通，而误以为中国传统文明是次等文明，是酱缸文明，只有基督教文明才是上等文明，才是救人救世的文明。搞历史不知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；搞比较史学，不知分阶段比较，而囫圇吞枣的比较之，那末博士论文就要发还重作了。

过分自尊，过分自卑，都有不是

笔者个人数十年来，在大学课堂里，在不同的拙著里，和与各不同学科的朋友们辩论里，就曾不断地强调，搞比较文化一定要分阶段：以古代比古代；以中古比中古；以近代比近代。因为文化是个活的有机体。他在不断成长，不断变化之中。所以我们不能囫圇吞枣地说：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；中国艺术不如西方艺术；中国建筑不如西方建筑；中国音乐不如西方音乐；中医不如西医；中国人的公德心不如西方人的公德心等等。这样一说，则中国文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甚至存在的必要了。

因此我们只能说：现代中国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音乐；中古时代的西方音乐，就远不如中古时代的中国音乐。现代的中国科学，远不如现代西方的科学；古代和中古的西方科学，就远不如古代和中古的中国科学（西方科学史权威李约瑟教授就是如此说的）。学术如此，人类的社会行为，和道德生活亦然，因为文化是个活的东西。它有兴衰，有起伏，有健康时代，也有生病时代，甚至兴衰嬗递，且有其周期性，不可以偏概全。

所以如果由于我们有个辉煌过去。“好汉只说当年勇”，便大吹中国文化是如何博大精深，西方的毛子们，哪能和我们相比。说这种话的好汉，不是个糊涂的满清遗老，便是个无知的民国军阀，自以为是。

相反的我们如果由于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，我们的中古文明被不幸地延长了，现代文明的出现被一再的耽误了，就把我们长至五千年的古文明鄙弃了，那也就是因噎废食，绝望地在牛棚之内“畏罪自杀”；自以为非了。——二者都有不是！



“王八蛋，侮辱领袖！妈的，我揍你！”

可是人类原是一种最复杂的动物；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明生活也都是最复杂的。尤其是生在这个文化转型期的历史三峡里，自以为是，和自以为非，都是一种群众的文化心态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不可相强。

因此笔者所作上述“二者都有不是”之论，也是一具有高度职业成见的说法。——自以为是，也是自以为非的说法；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的主观说法。

作为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史学工作者，在一个极度动荡的大时代中，既未进过牛棚，又未住过绿岛（台湾的一所监狱。——编注），这种人所说的话，难免过分冷静，与这个热乎乎的时代，显然是不易吻合的。——胡适之在抗战初期，那个热乎乎的高调时代，大唱其“低调”，所犯也正是这个毛病。与时代脱节，不足为训也。但是他也有他的历史的意义。

吾友柏杨就不是这样了。他在台湾被判了个没有执行的死刑；他是个热乎乎时代中一位热乎乎的人物。他命中注定是这个时代潮头上的人物。他无法遁世逃禅，或靠边站，坐观人家的成败。他注定是这个时代舞台上的演员，参与演出。他不能安静地（像笔者不才这样）坐在观众席上鼓掌喝彩，或喝倒彩。有灵感，便写一篇自觉甚为客观的剧评。没灵感，没时间，就拉倒。

当然喝倒彩，写剧评，有时也会出毛病的。但是不会惹起太多的深仇大恨。加以躲在租界里有锡克族的红头阿三，保障“人权”和“言论自由”，也多少有点安全感。加以你不怒脉贲张，人家也就不会磨拳擦掌了。

柏杨兄就不然了，他是舞台上当红的演员，善于当众“抓根”，引起满堂喝彩，欢声雷动，这影响就大了。笔者便亲眼见过，那是在抗战期间的大别山的舞台上，以下是两位演员的对话和后果：

演员甲：我这个老百姓最怕保长。

演员乙：保长又怕谁？

甲：怕乡长。

乙：乡长又怕谁？

甲：怕县长。

乙：县长又怕谁？

甲：怕李主席（安徽省主席李品仙）。

乙：李主席又怕谁？

甲：怕蒋委员长。



乙：蒋委员长又怕谁？

甲：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

蒋委员长怕五阎王！

他这话一出，全场数百观众，顿时哄堂大笑，两演员也得意非凡……殊不知就在这哄堂时刻，有两位军人模样的人物，忽自座位站起，大叫：

你这王八蛋，竟然当众侮辱领袖！

妈的，我揍你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二人便跳上舞台，“揍”起来了。一时秩序大乱，我们尚未看完的戏，也就只好散场了。

事实上吾友柏杨在四十九岁（1968）那一年，也在相同方式下，以大力水手的巧言抓根，被军人模样的人物骂“王八蛋，侮辱领袖，妈的，我揍你”，捉将官里去，弄得妻离子散，并被判了个没有执行的死刑的。这分明是一桩闹剧，竟闹得一位名作家，家散人亡，九死一生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朋友，这原是个不讲理的时代，有什么理可讲呢？在这种不讲理的社会之中，我国古代儒家书酸子，就告诫过我们：“处乱世，危行言逊”，只有这样才能“明哲保身”。而我们的柏杨却早被晚娘打成一条硬汉子，不信邪。看到世有不平，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而他又是能以巧言惑众的天才，……那就只有捉将官里去了。

朋友，我们这个三峡时代，多么可怕。我们今日能把“活着”回来的柏杨，选出来作一番“个案研究”，开个研讨会，也不算是多余的吧！

泛政治史观与社会异化

柏杨，无可否认的，是我们人文学科里的一位天才——文史哲、散文、小说、诗歌一把抓的天才。在历史方面，他应该被编入“通史家”这一范畴。但是搞通史，他难免也有点比重失调——他的兴趣和注意力，是过分地偏重于政治史了。尤其是着重于帝王将相，后妃公主的政治史了。梁启超说中国传统的历史，只是一部“帝王家谱”。但是要做个家谱专家，实非易事。事实上在今日海峡两岸的史学界中，把这部家谱翻得最彻底的，却远不是那些名满天下的博士院士，讲座教授和大师小师呢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有几个聪明的风云人物，对古典史学，做过点十年寒窗的基本功？有之却是这位一张实际文凭也没有的柏杨郭衣洞也。这也是笔者这个败絮其中的史学教授，对他最心折的地方。但是在现代史学中过分着重于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，则历史上就无人不丑了。这也是柏杨酱缸哲学所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。





从美学(Esthetics)的观点来看那些搞政治的大小政客(包括未入流的候补政客,和挤不进政治内圈的边缘政客),他们的吹牛拍马,胁肩谄笑,那才是天下之至丑也。柏杨在治史范畴里,长年累月,经常在政治史中,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中兜圈子。“上山则见虎,下泽则见蛇;入虎之室,入蛇之穴”,自然也就无人不丑。这是他的智慧生活(intellectual life)中的极限使然,无足异也。柏杨不是“黑厚教主”,但他对一般“丑陋”现象的描绘,则时时在李宗吾的“心黑皮厚”两大范畴中兜圈子,就知道,政治史,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,在他观察中的比重了。

再有一点,柏杨是一位目光锐敏的社会观察家,但是他对“转型社会”中,人类社会行为中的“异化”异象,则掌握不够。因此他对中西社会行为的比较评论,有时就难免有偏激之见了。——这些都是柏杨的政治哲学,社会哲学的精髓所在,其语虽巧,其意至诚。不是一般的矫揉造作,和哗众取宠的鄙俗作品。在一个古老文明大国里,市井中自有通人。我们不能小视社会上有读书习惯的广大读者群。套一句左翼宣传家的口头禅,那就叫做“人民眼睛是雪亮的”。“是非自有公论”,任何有技巧的宣传家,诡辩家,也不能“一手遮天”。林肯说得好: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,欺骗少数人民于永远;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。——因此柏杨的丑陋论是他出诸内心的观察,不是昙花一现的哗众之作。有心的读者读后,面红耳热之余,也颇能心平气和的接受之。因为一般读者也和作者一样,对异常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行为是一种社会转型期的异化现象,缺乏掌握,大家都只看中柏杨所举的形而下的实例,而忽略了那看不见,摸不着的形而上的规律了。

由恨之深到爱之切的政治青年

遍读千万言的柏杨之书如上述者,我们不能不承认,作者生命中有个“恨”字。但“爱”与“恨”,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。有痛恨才有狂爱。反之亦然。因此在柏杨的潜意识里,也寄生着强烈的爱欲。这种爱,他不能如常人一般,先从父母爱起,作同心圆式逐渐向外界扩张,以施之于社会国家,乃至全人类,以及于禽兽。既失父母之爱(尤其最重要的“母爱”),柏杨的爱,便形成认定目标,作直线条的向外喷射了。柏杨又是个早熟的天才儿童,在性爱方面,当其他缓进儿童,尚不知“性”为何物时,小郭已经两度结婚同居,呱呱生女矣。

性爱只是爱的一方面,性爱既经满足,则其潜存之爱:爱国家,爱民族,爱主义,爱领袖,爱阶级,爱弱者,爱禽兽,爱艺术,爱写作,那就有说不尽之爱了。

笔者与柏杨有同庚之雅。我二人都是猴年(1920,民国九年,庚申)出世。我二人幼年的遭遇,可说是完全相反。我有个出生年月日时的“八字”,可以找算命先



生“算命”。可怜的郭衣洞，出生年月日时只剩个“二字”（庚申）。算命先生对他就不能算命了。我二人虽生在完全相反的环境里，我们却生于同一个时代，有一个共同的次文化。这项共同的次文化，却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，如醉如痴地投入一个伟大的浪潮，不能自己。——这一浪潮便是奋不顾身地抗日救国！我们的总目标虽完全相同，我们在不同家庭，不同的集团所炮制出来的青年，却有不同路线。

就以我个人来说吧。我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家庭。家庭经济，可以支持我走传统社会中所谓“正途”。从小学、中学，按部就班升入大学，甚或留学。

柏杨与我就适得其反，他走了一辈子偏锋。由于不幸丧母；更不幸是受晚娘之厄，他一辈子无法在科举中生存。他造假学籍造伪文凭，挤入高教，最后还是一凭莫名。他投笔从戎，上不了天空，也上不了前线，最后却当起国家的军政工干部来。

柏杨是在1938年，他十九岁（实龄十八岁）那年，在武汉加入国民党，由蒋委员长所亲自主持的青干班受训的。他说，“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，但却陪伴我终生的一段时光。”（见《柏杨回忆录》第14章）且再抄一段，这位爱国青年，此时的心路历程：

在“战干团”的时候，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。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，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——在一夕之间，长官告诉我：

“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！”

我是既兴奋，又惊讶，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荣耀。我下定决心效忠领袖，愿为领袖活，愿为领袖死。从我当仪队的那时候起，单方面这样赤胆忠心，假如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，我会用我的血肉之躯，保护领袖，跳起来挡住子弹，或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。

全国青年一条心只此一次

柏杨记述他这段心路历程的时间是1938年的春夏之间。那是我八年抗战最高潮期，日寇陷我首都，实行“南京大屠杀”，杀我军民三十五万人的鲜血，尚未全干，敌军正指向我政治核心。中华民族这时是真正的“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国共两党的所谓“合作”，这时也是最真诚，也是惟一的一段，推诚相见的时期。这时从前线退往武汉的热血青年，数十万人。十九岁可能是大多数！笔者这时也正是十九岁，与一大群十八九岁的毛头，也正在武汉街头露宿，以血肉之躯，任凭敌机来日夜轰炸。

武汉那时是我们这批抗战毛头的集散之地。时机巧合如柏杨者，就光荣地做了“英明领袖的子弟兵”。额满见遗，就考虑北上延安，西去成都（军校），南下泰和



(战干四团,蒋经国的基地)。笔者对这三个去处,都曾严肃的考虑过。终以畏首畏尾,还是追随不断的流亡潮,退入湘西。回首六十前往事,读柏杨之书,盍胜沧桑之感。若说近百余年来,亿万中国热血青年,只有一条心,也只有1938年那么一次。我何幸而生此代,竟能一见之。……柏杨便是我们这一代,这一段时间内心路历程,最生动的记录人。

转型期中的幸与不幸

话说回头,敢作敢为的柏杨,那时正站在这个前仆后继鲜血浪潮的最前线,是个领导分子。笔者这个畏首畏尾的无用之人(也可说是个“佳子弟”,“好学生”吧),也卷在这个浪潮之中,做个小泡沫。然目睹其惊天动地的全部过程也。老年做个“历史家”,回首当年,盍胜浩叹!

国共两党的此起彼伏,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波翻浪滚,自有其文化转型的宏观历史在。在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中,浮沉翻滚,狗熊英雄同其命运,哪能以成败论英雄?——一言以蔽之,一切一切,都是民族文化转型期中的历史现象。卷入其中的个体,身不由己,有幸有不幸。“黄巢杀人八百万,在劫者难逃!”朋友,你说这是俚俗话?!殊不知,我们的俚语俗话,往往都富有极高深哲理的。

像柏杨这种誓死拥蒋的热血青年,撤至台湾之后,思想逐渐成熟,回首大陆上溃败往事,痛定思痛,难得糊涂,窥破了独裁者的真面目,由誓死拥蒋,转而讥刺反蒋,终被捉将官里去,判了死刑,几遭不测。

柏杨这桩冤狱,这个个案,是个特殊例子吗?

非也。朋友,它是个“公式”。——一个专制政权杀人的公式。

三大部狱中书

柏杨这三部书(《中国历史年表》、《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》、《中国人史纲》),职业史学家可能又有其评头论足之处了。但是你若悟解出三部书皆成于牢中(实在应该列入金氏纪录),你就大惊失色了。我们不妨再去查查“四库总目”,看看有几本汉语著述,成于牢中?不学如愚,当未发现呢!再看西文著述《马可孛罗游记》似乎可以相比,但那是成书于战俘营。战俘营并不是监牢。再者马可孛罗所写的只是一部“口述历史”,一个脑袋一张嘴,半系记忆,半系胡吹,用不着一本参考书,不像柏杨之作,一部廿五史的参考书就有八百本之多。胡适之先生



说，“只有你自己写下来的知识，才是你自己的知识。”笔者读史数十年，对这句话真有切身的感受，所以也服膺终生。

写工具书的人，每为自大而浅薄的史家所窃笑。但是你如知道，只有你自己写下的知识，才是你自己的知识，你才知道写工具书者之可羨可敬。因这是治史学的“基本功”。由博始能返约。对汉唐宋明清的基本史实，一知半解，而奢谈是某专题某专题的专家，吾知其不足论也。不信你让他去和柏杨盘盘道，啥是七国之争？啥是八王之乱，他不是信口开河，便是出口便错。——柏杨是我好友同行。但我对七国之争、八王之乱这类基本史实，在柏杨面前，只敢请益，不敢盘道。原因便是：人家有“写下来的自己的知识”。我有些啥呢？我知道，我们同行中，就有人不服这口气。硬要说，柏杨是啥鸟历史家呢？心怀这种不平的大师们，其实是头巾气的成见在作邪。学问比我大，胆子比我更大罢了。道是同样盘不得的。

从作家明星到史学学究

当然为写工具书而写工具书，往往难免作茧自缚，陷入学术技工的框框。但是柏杨亦自有其反传统的酱缸哲学的一家之言。你说他偏激，朋友，著书牢中，你还要他心平气和呀？在杨朱墨翟之言遍天下的时候，大谈仲尼之说，也是一种偏激之言。马恩列斯之说，岂不更是偏激中之偏激了。它还不是主宰了我中华史学界五十余年，至今不衰。

只要言之成理，偏激何伤哉？不同意他的话，驳他个体无完肤嘛。不同意就把他关起来，那就是法西斯了。搞民主要，我不同意你的话，但我注重你有说话的自由。

予初读柏杨狱中书便大感兴趣。盖柏杨明星作家也，惯以巧语惑世，而名满天下。孰意一旦背上文字狱，被捉将官里去，他竟能摇身一变，变成个历史学究来。吾不禁在三峡舟中的观众席上，大鼓其掌，而连声叫好。何也？盖明星作家者，明星也。天上明星固然千年不变，地上明星，终会人老珠黄。

余于战后观“梅剧”，见梅兰芳先生以六十老翁之身，在舞台上自称“奴家十八”，曾引起哄堂大笑。人老珠黄虽梅郎不能免，况其他明星乎？

明星防老之术，就不要怕老。要从妖冶明星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个老学究；戴上老花眼镜，翻线装书，然后哼哼唧唧，显出道骨仙风，那就愈老愈靚了。

余尝恭维张学良将军赵夫人曰，“没有夫人的善加护持，少帅活不到如此高龄呢！”夫人谦逊曰，“哪是我的功劳？蒋哩！”换言之，若不是蒋公把他关了五十年，那位吃喝嫖赌成性的张少帅，恐怕早就“蒙主恩召”了。



柏老郭衣洞先生也正是如此。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,他那派花言巧语,还能说多久?最后如说出个“奴家十八”来,岂不糟糕?!柏老毕竟是文曲星下凡。正在那需要摇身一变之时,他就被小蒋先生关了起来。朋友,读破万卷书,作个老学究是个好变的?三更灯火五更鸡,需要“十载寒窗”呢!小蒋先生是可是人,他就知道柏杨有此需要而把整整的关了十年,就关出个院士级的学究了。

胡三省后第一人

现在我们就可以谈谈“十年通鉴”时代的晚年柏杨了。

我尝为柏杨版《白话资治通鉴》打边鼓说,胡适梁启超和李敖,都曾为现代大中学生开列国学必读书,洋洋数十种的“书目”。若有人焉,也要我开个类似的“书目”,那我就“一书定天下”,《资治通鉴》。看不懂原文,那就看柏杨版白话通鉴。凭良心,我不是为柏老溜须,我是自初中时代起,已说了数十年。原因是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,如想对中国固有文明,知道点大略,最实际而可行的工作,便是一部《资治通鉴》。

为什么呢?原来《资治通鉴》便是一部按年编选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大“文摘”,掌握了这部书,不特千年国史如在掌中,其他一切古典文史名著,皆可触类旁通。足下如也有胡适所说的“读书习惯”,害病也要看书,那就有条理地触类旁通了。真能如此,乖乖,那就不得了也!曾国藩说:“得富贵如登高山,不知身之自高也。”搞党做官如此,为学亦然也。您如是位银行副总裁,周末无事,不去打它二十四圈卫生麻将,而去读它二十四卷古典名著。日积月累,你夫人打了数百圈麻将,讲了数百小时的“牌经”;你足下于同一时期,却读了数百卷国学名著,包括《金瓶梅词话》。乖乖。哪还得了!亲爱的副总裁,“不知身之自高也。”您如在什么鸡尾酒会,碰到些趾高气扬的文史专家、院士博士者流,三言两语,一杯老酒未下肚,对方就已经变成烟销云散的狗屁了。就有这么灵!副总裁兄,不妨试试看。

今次圣诞节,笔者收到沙坪老同学、经济学家陈修明兄,一张贺年片,上面写了一句话:“退休后总算做了一件大事,我把柏杨的通鉴读完了。”愚得卡大惊,自思以后和修明吹牛,谈到八王之乱、七国之争,可别出岔!!我对读者陈修明尚有此钦羡之心;我对译者郭衣洞,敢不毕恭毕敬?!

朋友,读书为学,是硬梆梆的死功夫,老而弥健;他与花拳绣腿的明星作家,和金光灿烂的院士博士,不一定是同一类动物呢。所以笔者便不时向柏杨说,古往今来,把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巨著一个字一个字(注意“一个字,一个字”)的细读无数遍,再把它“写下来变成自己的知识”的傻子,足下恐怕是胡三省以后的第一人



了。——对这种下过“乌龟功”(一个字一个字上爬过去)的人,我辈“跳高栏”(看不懂,不愿看就一跃而过之)的读者,能不脱帽致敬?

柏杨从其极端反传统立论,与司马光的“臣光曰”唱对台戏,而大搞其《柏杨曰》。传统遗老中衣冠之士、卫道门徒,对他可说是深恶痛绝。柏老虽以“匪谍”之罪入狱,激进的左翼权威,对他也如见蛇蝎。极左极右两派都要把他斗垮斗臭!而柏杨至今才名未减,仍是读者如云。何也?君不见距今两千年之柏杨王充乎。王充著《论衡》,由于立论诡异,卫道之士衔之入骨,诸代帝王亦厉申严谕,列为禁书,而《论衡》如此故。清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,纪晓岚始为其平反说:“终因好之者众,未能废也。”

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;读者自有公论。

柏杨柏杨,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!

1999年5月14日草于合肥安大外招南楼;

6月4日增订于台北青年会